

《文史哲》编辑队伍风采



曹峰:《文史哲》特约编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曾任山东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本科毕业于上海大学,硕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发表论著近180篇,译文40余篇,出版专著、编著、译著20余部。

建立大问题意识和大学术格局

我大学学的是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阶段学的是先秦史,博士阶段学的是思想史专业,现在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从考古到历史再到哲学,专业跨度很大,如果按照严格的学科划分,很可能被视作杂而无当、术不专精,而找不到适合的工作。现在能够安心地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要感谢人生的际遇。

2004年,我已经在日本博士毕业,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找不到合适的学术岗位。踌躇之际,当时担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的王学典教授访问日本,我给他做翻译时,一方面被他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感召,一方面也被文史哲研究院这个打通学术壁垒,致力还原古典的特殊机构吸引,短短几天,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来山东大学。在这里,古典文献研究、出土文献研究、古代思想研究被无缝衔接起来,让我有如鱼得水之感,学术成果很快涌现出来。在山大期间,王学典教授始终鼓励我在从事具体研究的同时,不忘建立大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格局。“疑古与释古”专栏的设置是《文史哲》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活动,我参与的对池田知久教授、裘锡圭教授的访谈都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受王学典教授激励写成的《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一文,同时被《人文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这是人生难得的高光时刻,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文史哲》具有不同于普通学刊的大胸襟大视野。

2009年之后,王学典教授也让我参与“中国哲学”板块的编辑。《文史哲》对学界的引领和激发,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王学典担任主编后明确的办刊宗旨——“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王学典教授最近指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向“以中国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变,这也可以概括为“本土化转向”,这一转型并非固步自封,而是以更为准确的自我认识和更为从容的精神面貌走向世界。“中国哲学”板块这十几年的历程,有大量的论文,都是通过深刻反思西方学术的影响,以更为公正的态度分析和研判中国思想价值的本来面貌和未来影响。中国学术走向的转变,王学典教授及其主持下的《文史哲》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刘培: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二级教授,中国辞赋学会副会长,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常务副会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一般项目两项。出版专著多部,发表论著近百篇。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文史哲》文学研究板块巡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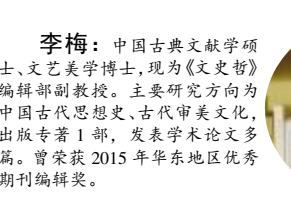
创刊之初,面对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文史哲》的文学研究开始了努力探索。1955年第1期《文史哲》刊发了17篇《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这奠定了日后的研究格局:立足于学术本身,坚守架构马克思主义新学术的初衷,用唯物史观来审视文化遗产。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期间,《文史哲》刊发了一系列古代文学商榷文章,显露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审慎的评判态度,亦使学术争鸣成了《文史哲》最显著的特色。

随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逐渐彰显出山东大学文学学科的特色:袁世硕先生、张可礼先生、龚克昌先生、刘乃昌先生等学者的研究与探索,构成了《文史哲》古代文学研究的主体;辞赋研究则是这一板块的特色。“学者谈治学”是这个时期颇具特色的栏目,所刊发的多位学术大家治学方法对于青年学者极有益。扎实的文献梳理考证与宏阔的理论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力以及深厚的人文情怀,是新世纪以来《文史哲》文学用稿的鲜明特色。《文史哲》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积极预流当下学术潮流,在建设性回归传统学术,积极提倡能够贯通文、史、哲的学术风尚方面多有创获,成为刊界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起到了一定的引领研究风尚的作用。

文艺美学与文论是《文史哲》文学板块的又一个重要领域。在20世纪五十年代之初,《文史哲》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与文学批评给予了持续关注,并刊发了诸如王朝闻先生、汝信先生、钱中文先生、黄药眠先生、吕荧先生等知名学者的卓识高见。当时尚属学术青年的李泽厚先生,作为创刊元老的华岗先生,都以《文史哲》为阵地,发表了许多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美学的文章。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一领域所刊文章逐渐转向传统文论研究方面,并形成了重视文献梳理与理论概括的刊文特色。

《文史哲》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创刊以来,鲁迅文学研究是发文重点,聚集了一批重要的专家学者。进入21世纪之后,《文史哲》又积极接引以回归史料、回归历史现场为特征的“左翼文学”研究。此外,与作家互动也曾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特色。莫言先生早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即曾在《文史哲》连续发表关于小说创作的文章。

七十多年来,《文史哲》的文学板块始终重视文学的现实性与理论性,强调学术话语的预见性与前瞻性,既维持着杂志一贯高水平的刊文标准,也反映着中国文学学科的变迁历程。这与《文史哲》“学者办刊”的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文学研究板块的编辑拥有各自的研究专长,享有一定的学术声誉,凭借专业、编辑与专业有效地与学术研究者、文学创作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形成并巩固着《文史哲》文学研究的优良与特色。



李梅: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文艺美学博士,现为《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审美文化,出版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曾荣获2015年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编辑奖。

《文史哲》的古典学术风格

《文史哲》杂志所致力推动的古典学术研究,并非纯粹在故纸堆里做学问,而是有着强烈问题意识的古典学。因此,提炼与锻造古典学术论题,使似应藏在象牙塔中、与现实没什么关联的古典学术与公共学术话题结合起来,成为《文史哲》杂志的一个重要特点。自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文史哲》就注重开掘新选题,鼓励开展大规模的学术争鸣。与此同时,《文史哲》杂志还举办了一系列“小规模、高层次、大动作”的古典学术相关会议。这些争鸣与会议显示,《文史哲》杂志所重视的古典学术研究,并非古典学术的细枝末节,而是与时代思想、社会现实联系密切的学术话题,体现出的是其一贯之的、敢于担当的社会关怀和人文情怀,而这最终形成了杂志学术性与思想性并重的学术风格。

《文史哲》并非中文、历史、哲学三大学科文章的“拼盘”,在这三大学科的外在区分之下,有一个古典学术的暗线作为统合。尽管现当代学科专业界线越来越明晰,越来越不可逾越,但古典学术就其本身来说,却很难泾渭分明地进行学科划分。而进行古典学术研究的学者也常常发现,自己的综合性研究成果,难以在越分越细的专业刊中找到园地。古典学术研究如何摆脱这一现代学术分科困境?《文史哲》杂志的做法是以问题为中心凝聚学科,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肢解问题。

《文史哲》努力策划具有综合性和跨学科性质的栏目的做法,适应了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自身特点,也铸造了《文史哲》杂志自身的特点和风格。清华大学仲伟民教授曾将此特点概括为“小综合、大专业”,认为这一特点使《文史哲》“在专业刊和综合刊之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且“在未来中国学术发展和创新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编辑上的严谨性,也是主加厚重古典人文学术的《文史哲》刊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了,人力有限,人眼有阙,要做到全无一处错误是不可能的,唯有不断努力。这正如《文史哲》杂志第1卷第2期“编者”的话所言:“在校对方面,我们力求仔细,付印的时候,编辑部同人全部出来校对;但根据第一期的经验,错字仍然存在,这证明我们的努力还不够。”“消灭错字”是编辑同仁的主要目标。



孙齐:历史学博士,2014—2016年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为《文史哲》编辑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中古史、道教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文史哲》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我们经常说,《文史哲》所享有的荣誉,主要来自于她所发起和推动的一场又一场学术论战和重大讨论;我们同时又说,《文史哲》走的是一条不为时风所动的厚重办刊之路。在很多人看来,学术论战是趋时之举,理论探讨又难免空泛,似乎都与厚重的研究不相吻合。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学术研究只有具有思想,才能具有深度;只有观其大体,才能致其精深;只有充分讨论,才能实现创新。

《文史哲》特别重视文章所具备的见解深度。“理论性不强的文章是没有灵魂的”,“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是杨向真、赵继生等编辑部前辈的寄语。以古代史研究而言,《文史哲》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创刊的王仲萃、王亚南,九十年代创刊的田昌五、宁可,2000年以后创刊的金光、黎虎等先生的力作,都是在具体研究上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史学家们不可多得的、直接展现自己独特理论思考的长篇杰作。

历史研究的“初心”,是通过回顾我们过去的道路来理解我们未来的道路。《文史哲》数十年如一日关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认识问题,正是因为这些讨论的背后都隐含着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切和思索。为此,《文史哲》在20世纪五十年代发起了中国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马克思主义萌芽等问题的大讨论,自2008年开始设立“中国社会形态问题”栏目,于2010年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人文高端论坛,并将在2022年召开“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人文高端论坛。

《文史哲》重视对权威观点与范式的反思与突破。健康的学术讨论、商榷和批评,是推动学术创新和纠错的关键机制。“百家争鸣”是学术刊物的生命线。从创刊开始,《文史哲》就确立了不论身份地位,提倡自由讨论,反对定于一尊的原则,刊发了大量反思、挑战学界权威观点的文章,有力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健康发展。20世纪五十年代黄云眉与陈寅恪的商榷,七十年代萧涤非与郭沫若、八十年代王学典与黎澍的商榷,都已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文史哲》于2006年开设的“疑古与释古”专栏,则给当时与“走出疑古”思潮不同的思考提供了进行学术切磋的难得平台,亦在《文史哲》办刊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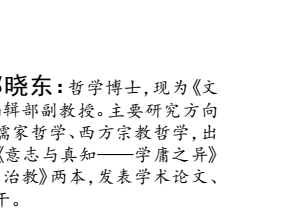


邹晓东:哲学博士,现为《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儒家哲学、西方宗教哲学,出版专著《意志与良知——学庸之辨》《性善与治教》两本,发表学术论文、评论若干。

不断探寻学者、编辑双重身份的结合点

2015年6月,在成功入职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之际,我感到自己犹如一艘小船,终于赶在坏天气来临之前驶进了一片相对安全的水域。说“相对安全”,是因为我担心编辑杂务太深似海,生怕自己的学术梦就这么抛锚在“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底洞里。近七年来的实际工作体验告诉我,“学者办刊”在《文史哲》确实不是一句空言。编辑之长,但凡有人,这里“学者”在见识、交流与写作的境界上,想不进步都难。2020—2021年,参与筹备七十周年刊庆并合作撰写《文史哲》与中国人文七十年(1951—2021)的经历,更是全面刷新了我对《文史哲》刊风基因与现行办刊宗旨的认识与理解。我相信,我对这份职业已经产生了真爱,并约略看到了兼顾编辑职分与学术梦的希望。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勉励“高品质的学术刊物就是要守初心、引领创新”,把引领学术创新标定为办学术刊的初心。通过办刊来引领学术创新,这是非“编辑”的学者无缘从事的工作,也是“学者”的编辑无力从事的工作。这一勉励,内在要求学术刊物走“学者办刊”的路径,亦将探寻学者、编辑双重身份有机结合机制的问题推向了前台。诚如王学典主编和韩波老主编在谈话时所言,科研工作与编辑工作之间的矛盾是学界编辑部中始终存在的普遍矛盾。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工作处境,化解好“学者、编辑双重身份如何分配心思、切割时间”的纠结。过去一年,我在学界已有的“学刊及其编辑回归学术共同体”“学而优则编”“编校分离”设想基础上,提出了“学刊编辑主持‘实用编委’工作室”,“把学术论坛变成编辑的工作现场”等尝试性主张。这些尝试性设想虽然粗浅,但对我来说,却正是不断探寻学者、编辑双重身份结合机制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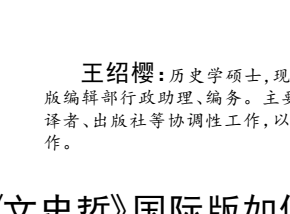


王绍樱:历史学硕士,现为《文史哲》国际版编辑部行政助理、编务。主要负责联络作者、译者、出版社等协调性工作,以及办公室日常工作。

《文史哲》国际版如何打好组合拳

《文史哲》国际版致力于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其国际性不仅表现为面向海外学术界、遵循国际学术规范,还贯穿于编辑部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编辑一期杂志,不止是语言的转换,更需要大家拧成一股绳,需要多方力量的通力合作。比如,作者们常常感叹,“我的文章可不好翻啊!”古典学术在表述上往往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包含大量专有词汇,征引各式古籍文献。要想使其在思维和语言习惯上为海外读者所接受,前期编辑中文稿件时就要考虑到,如何帮助海外译者更准确地进行理解。为此,作者和编辑必须深入加工稿件:剪裁篇幅以突出文章的思想价值,同时单独把古文词句转化为现代白话文,提前严格按照芝加哥格式处理学术规范,对历史人物生卒、年号起止等做出规范的时间标示等,最终形成完全面向译者的、具有辅助性、工具性的底本。这是规范翻译错误、保证后续流程顺利进行的重要步骤。

即便有前期的细心准备,翻译诸子、汉赋等主题的文章仍然是个麻烦。为此,海外译者们尽心尽力、不辞辛劳,力争最大程度地呈现出古典学术研究自身的脉络和语境。有一位澳大利亚籍译者 Michael Broughton,他所提供译稿内容经常比中文稿多出几页,仅脚注就增加十几条,均是他旁征博引,对文章一笔而过的专业词汇做出详尽阐释,以便海外读者流畅阅读。我们的薪酬标准相对也较为低



史佳威:科技哲学硕士,2020年进入《文史哲》编辑部,负责编辑部新媒体运营工作。

步履不停,不断前行

2020年夏天,我来到《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一个我在学生时代仅能仰望的地方。初到编辑部时,面对各类古文、古史、古哲的挑战,我有时觉得力不从心,需要不断“补课”,很多学术论文学术性较强,加上引注篇幅一两万字,往往一篇完整稿件下来要反复细读很多遍,才能保证文本及标题、标题的准确性;而新媒体工作直面读者和即时反馈的性质,更让我如履薄冰。幸运的是,编辑部的各位老师都对我非常包容,也从不舍惜指导与帮助。在这种无限包容和不断鼓励中,我在编辑部不断进步。

在《文史哲》迎来了她的“七十岁生日”刊庆之日,我有幸见到了来自文史哲各领域的顶尖学者。大会上听着各位学者的精彩发言,讨论会上看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火花,会后刊出“百家争鸣”的作品,我突然理解了《文史哲》前辈们身上那种使命感与责任感,也明白了坚守的意义。在《文史哲》人的心中,对学术和真理的不断追求和奉献是一桩事业!也正是这薪火相传的《文史哲》精神,让编辑部老师们步履不停,不断前行。



刘丽丽:历史学硕士,现为《文史哲》编辑部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主要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

甘做老黄牛

每当翻看那些泛黄的老照片,脑海中便闪现出一幕幕老编辑们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忙碌的身影。尤其看到比较熟悉的退休老师,感触更为深刻。照片中的他们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每个人无一不是从帅气的小伙子、漂亮的小姑娘奋斗到了满头白发的老者,他们为《文史哲》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可以说,没有历代编辑70余载风雨雨的努力,就没有《文史哲》今天的成就。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薪火相传”到我们手中,除了倍感自豪之外,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办公室的工作原本就繁杂琐碎,而编辑部办公室的工作更有其特殊性。最显著的一点是,编辑部办公室面对的是一篇篇稿件、一期期杂志,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读者,需要做好作者、读者与编辑之间的“中转站”。这种特殊性更加需要严谨、仔细的态度,容不得半点马虎,也不能有丝毫侥幸。“不因



时东武:现为《文史哲》编辑部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1987年到《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以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至今已35年整。

细耕责任田

事小而不办,不因事难而怕为”是我们一贯的办事原则。有问题不可怕,也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解决好,哪怕解决不了,也要尽力去做。

办公室工作对内需要做好“服务员”“小管家”,热心为编辑们做好各项服务,对外要做好“联络员”“协调员”。正因此,办公室的工作有千头万绪,容易顾此失彼。为此,工作备忘录总是记得密密麻麻,将完成的打上对勾,将未完成的做好标记,及时查找、落实未完成的工作。只有这样,工作起来才能有有条不紊,才能做到“件件有交代,项项有落实”,力求不让自己在这一环节延误,不让事项在自己手里积压。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在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指引下,我们将继续发扬“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老黄牛精神,以饱满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投入到日常工作去,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



时东武:现为《文史哲》编辑部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1987年到《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以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至今已35年整。

步履不停,不断前行

2020年夏天,我来到《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一个我在学生时代仅能仰望的地方。初到编辑部时,面对各类古文、古史、古哲的挑战,我有时觉得力不从心,需要不断“补课”,很多学术论文学术性较强,加上引注篇幅一两万字,往往一篇完整稿件下来要反复细读很多遍,才能保证文本及标题、标题的准确性;而新媒体工作直面读者和即时反馈的性质,更让我如履薄冰。幸运的是,编辑部的各位老师都对我非常包容,也从不舍惜指导与帮助。在这种无限包容和不断鼓励中,我在编辑部不断进步。

在《文史哲》迎来了她的“七十岁生日”刊庆之日,我有幸见到了来自文史哲各领域的顶尖学者。大会上听着各位学者的精彩发言,讨论会上看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火花,会后刊出“百家争鸣”的作品,我突然理解了《文史哲》前辈们身上那种使命感与责任感,也明白了坚守的意义。在《文史哲》人的心中,对学术和真理的不断追求和奉献是一桩事业!也正是这薪火相传的《文史哲》精神,让编辑部老师们步履不停,不断前行。